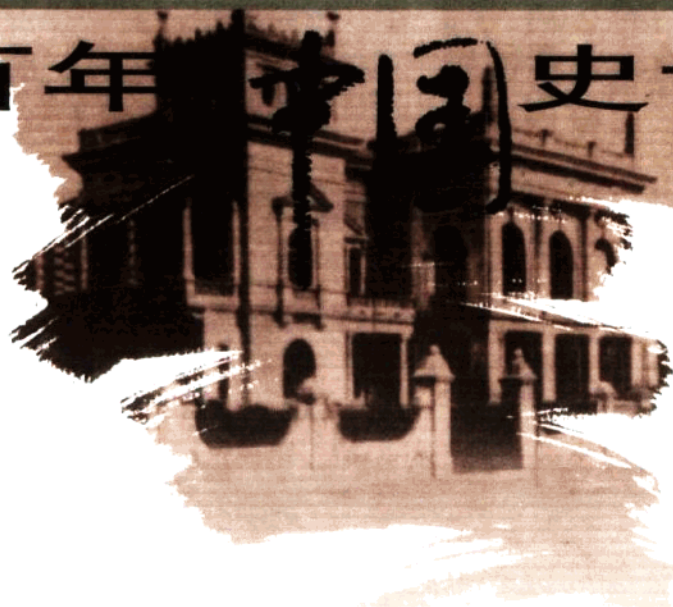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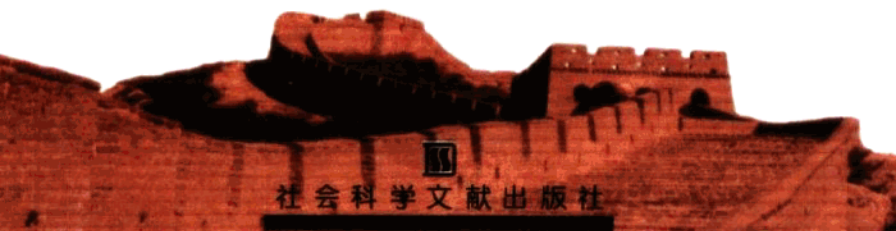


百年中国史话



◎ 陈争平 / 著

金融史话



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

■ 名 誉 顾 问 胡 绳 刘大年
■ 编委会主任 王忍之
■ 主 编 王忍之 张海鹏

编辑委员会委员 (以姓氏笔划为序):

马 勇	王 正	王庆成	王忍之
李文海	何秉孟	余绳武	张海鹏
金冲及	郭永才	姜 涛	徐辉琪
龚书铎	谢曙光	戴 逸	

常务编委:

张海鹏 徐辉琪 姜 涛 马 勇

《百年中国史话》丛书总序

王忍之

在新旧世纪交替的日子里，我们将这套《百年中国史话》丛书，奉献给正在跨入新世纪的祖国人民。

1840年，作为西方资本主义强国的英国发动鸦片战争，首先用坚船利炮敲开以农立国的中国的大门。西方列强接踵而至，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侵略战争，并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强加给中国人民。古老的东方大国开始一步步堕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。中国人民为此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抗争，但总是一次又一次惨遭失败。夜漫漫，路漫漫，“长夜难明赤县天”……多少志士仁人在挫折中奋起，努力探寻救国救民和发展的道路。他们向西方学习，也向学西方有成效的日本人学习。可是先生们的侵略，总是在不断地打破着学生的迷梦。尤

总 序

其是日本帝国主义所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，更是旨在灭亡中国。没有现代化，固然无法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；但没有民族独立，更不可能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国家。以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，领导中国各族人民进行了争取民族独立、人民解放的英勇斗争，并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。

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，标志着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的终结。曾经饱受痛苦和屈辱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。中国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。这是历史的抉择。尽管在以往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，我们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有过挫折与失败，在今后现代化事业的道路上，也不会一帆风顺，但“坚冰已经打破，航路已经开通”。迎接我们的，是光辉灿烂的美好前途。

古人说过：“温故而知新。”学习历史可以使人变得聪明一些。毛泽东当年在延安曾把研究现状，研究历史，研究国际革命的经验 and 马克思列宁主义，作为改造党内学习的基本内容。他认为，不注重研究现状，不注重研究历史，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，是极坏的作风。他要求党的干部要真正懂得中国共产党的历史，真正懂得中国的近百年史。邓小平同

志、江泽民同志也经常提醒党员、干部和青年，要学习历史，尤其是中国近代史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。1991年，江泽民同志专门致信李铁映等同志，强调进行中国近代史、现代史及国情教育，使小学生、中学生、大学生认识人民政权来之不易，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。

正在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上跨入新世纪的中国人民，当然不应该也不会忘记过去的岁月，不应该也不会忘记自己曾经经历过的任人宰割的痛苦和屈辱，奋起反抗的失败与胜利，学习西方的经验与教训，建设现代化国家的成功与挫折。这是我们前进的起点，也是我们前进的动力。今天的青少年，是未来世纪建设国家的主力军。建设的重任，要求他们多懂一点中国近百年的历史。这就是这套丛书的编写缘起。我们组织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内外的专家学者，写出了大体上反映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九十多本小书。中国社会科学院还组织学者编写了一套《中华文明史话》丛书，它是向青少年朋友讲述中国古代历史的。希望这两套丛书能相互配合，成为我国未来建设者的好读物。

《百年中国史话》这套丛书，当然不可能囊括一切，但尽可能注意到各个方面，尽可能

总 序

全面地、立体地反映自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直到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 110 年间，也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的历史。这是中国历史的昨天。发生在昨天的许多故事，是值得我们永远记取的。这套丛书的各位作者在写作中，或者溶入了自己的见解，或者采纳了学术界的研究成果，限于体例，不能一一指出，谨在此向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长期耕耘的学者们一并致谢！

是为序。

二〇〇〇年三月

目 录

- 一 鸦片战争前概况 1
- 二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初期
(1840~1894) 9
 - 1. 外国金融势力的侵入 10
 - 2. 钱庄的变迁 18
 - 3. 票号的兴盛 22
 - 4. 金融危机与“红顶商人”的
 倒台 28
 - 5. 杂乱的通货 32
- 三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成时期
(1895~1927) 42
 - 1. 外国在华金融势力的
 扩张 43
 - 2. 中国新式银行业的
 兴起 51

3. 票号的衰落和钱庄的继续发展	59
4. 风潮迭起	61
四 全面抗战前十年 (1927~1937) ...	69
1. “四行两局”及官僚资本金融 体系的发展	70
2. 废两改元	77
3. 白银风潮和法币改革	79
4. 民间银钱业的变化	86
5. 上海——“东方的纽约”	89
6. 革命根据地的金融	95
7. 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金融	98
五 抗日战争时期 (1937~1945)	103
1. 日占区的殖民地金融	104
2. 四联总处及国民党政府对大后方的 金融统制	112
3. 法币超额发行	119
4. 国统区的黄金和外汇市场等	121
5. 抗日根据地的金融	126
6. 货币战——抗战时期的特殊 战线	136
六 解放战争时期 (1945~1949)	144
1. “四行两局一库”对金融高度 垄断	144

2. 国统区的恶性通货膨胀	149
3. “金圆券”、“银圆券”的崩溃	155
4. 民间金融业逐渐走上末路	166
5. 外国银行从中国撤退	171
6. 新民主主义金融体系在全国的 胜利	174
参考书目	182

一 鸦片战争前概况

金融活动在人类社会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一直处于中枢地位。在中国近现代经济史中，金融史亦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。

中国到明清时代时，自然经济虽然仍占统治地位，但商品的生产和交换已经越来越发达，市场经济萌芽也开始发展起来，清王朝统一中国以后，统治者采取了减免赋税、兴修水利等措施，使社会生产力从长期战争破坏下，逐渐走上恢复和发展的道路，各地区之间经济联系不断加强，国内市场不断扩大，商品经济因素比以前有了较大发展。

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，兴起了众多的市镇和农村集市，与繁华的城市市场交相辉映。商品经济最发达的江南，市镇和乡村集市已是星罗棋布。湖北的汉口在鸦片战争之前已成为拥有约 20 万人口的商业市镇。这时的国内市场体系已打破了过去的坊市制，形成以城市为

中心，市镇为据点，集市为网络，各级市场紧密联系的流通网。在国内市场上出现了不少商人群体——商帮，这是自明代中期开始出现的，以地域为中心，以乡谊为纽带，以会馆、公所为其在异乡联络场所的一种商人自助群体。其中，北方的晋、陕、鲁，南方的徽、浙、粤、闽等商帮等，都是活跃在国内市场上的著名商帮。一些显赫一时的大商人资本，在盐、茶、布、木等长途贩运贸易中发展起来，其资本额从明后期的大约 50 万~100 万两的规模发展到清中叶的 1000 万两计的规模。

随着商业和商人资本的发展，货币数量的增加和货币使用范围的广泛，各种金融组织也应运而起。

清中叶的金融组织增多，其中最主要的是以从事抵押放款业务为主的“典当业”，以经营货币兑换为主、兼营存放款业务的“钱庄”，以经营存放款业务为主的“账局”，和以经营汇兑业务为主的“票号”。

典当在我国起源很早，大约在南北朝时就有了主要由寺院兼办的从事抵押放款的“寺库”。到清中叶时已有一千多年历史。它是一种以衣物和动产抵押为手段的消费贷款。它主要是满足小生产者、城市市民和部分地主的生

活急需而存在和发展起来的。唐时由贵族经营，宋代以后民间高利贷资本也开始加入典当业的行列。随着历代典当业的推广，先后出现了“质库”、“质肆”、“解库”、“解铺”、“长生库”、“典库”、“典铺”、“当铺”、“质铺”、“印子铺”等名目。乾隆年间仅北京就有大小当铺六七百家。山西省的典当业更为发达，约有四千多家当铺。据研究者估计，清中叶全国约有两万家当铺。从事典当业的多为徽商和晋商。典当业在封建社会中起着调剂民间金融的作用，它的发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。

明、清两代由于白银和铜钱并用，经营兑换业务的信用组织盛行起来。一开始是摆摊，称“钱桌”或“钱摊”。一些米店、土布店、杂货店等商业组织也开始兼营银两和铜钱的兑换。后来发展出专门兑换货币的铺面，长江流域多称其为“钱庄”，其他地方，如北京、天津、沈阳、济南、广州等地也有称“钱铺”或“银号”、“兑店”的。到了清中叶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，钱庄、钱铺、银号等也迅速发展起来，北京在道光十年（1830）以前，开设的钱铺已有 389 家；位于长江入海要津的商港上海，在嘉庆二年（1797）以前，也已有钱庄

124家。当时上海已经设立了钱业公所，以维护同业利益。随着业务逐渐扩大，不仅经营兑换，同时还经营存款、放债等，大的钱庄还有代理县库、道库的。上海的大钱庄大多与行走南北洋的沙船业发生资金联系。沙船出海时，经常向钱庄借入大宗款项，在上海购买土布等货物，运往南洋福建等地或北洋山东、关东等地销售。这表明在鸦片战争以前，上海钱庄的信贷业务已经不限于商业而兼及交通运输业了。银号的职能基本上与钱庄相似，有的除了经营货币兑换、存放款业务外，还经营熔炼纹银。

乾隆中期以后，钱庄、银号等金融机构所发行的信用票据——钱票，也在一定范围内流通起来，发挥着代替货币职能的作用。当时习用钱票的地区主要是在北方各省，如山西、直隶、陕西、山东等省。这是因为北方“陆路多而水路少，商民交易……现钱至十千以上，即须马驮车载，自不若钱票有取携之便，无盘运之烦……甚便于民”。北京由于商业繁荣、交通便利，与京外各重要商业城市形成较为密切的经济联系。所以，京外钱庄签发的钱票，借商业贸易渠道流通于北京城内。

钱票的出现和发展，反映了金融信贷扩张

的结果，但是由于钱票的滥用，货币信用的过分膨胀，又必然造成金融上的紊乱和纠纷。道光五年（1825）和道光十年（1830）在北京曾经先后发生过因钱票泛滥，钱庄无法兑现而大量倒闭的案件。

除了北方省份外，在东南沿海各省，钱票的活动场所仍然是相当广阔的。例如，江苏省由商业交往而发生的货币清算上，一向是纹银、洋钱和钱票三者并用。两江总督陶澍在道光十八年就曾经说：“江南全省，通商大贾，皆以银易换洋钱，零星贸易，始以银易换制钱”，为了“便于携取”，又以银“更换钱票”；这种钱票“皆系本店所出，票到即行发钱，与现钱无异”。

上海钱庄使用庄票的历史较长，庄票在鸦片战争前已有了近百年历史。到1841年时，上海钱庄所签发的庄票面额达千两银者，已不希罕。在上海，不仅商品交换可以通过庄票成交，而且债权债务关系的清理，也可以通过钱庄庄票“到期转换，收划银钱”，相互抵消。庄票的出现和发展，表明上海银钱业在信贷上所达到的水平，在鸦片战争以前已高于沿海其他城市和内地城镇的信贷水平。庄票所固有的活力，在鸦片战争后上海口岸贸易的开拓中，

更发挥了过去意想不到的重要作用。

账局，又称账庄，是在城镇经营工商铺户存款和放款的信用机构。它产生于清雍正、乾隆年间，有的学者认为它是中国最早的银行。账局发源于我国北方，主要在北京、张家口和山西汾州、太原一带，多由山西商人经营。北京在清中叶工商业十分繁荣，“京城九门外，铺户何止数万”。京城工商铺户为了扩大经营，往往利用借贷资本，“各行店铺自本者十不一二，全恃借贷流通”，这为山西商人在京开设账局提供了基础。张家口位于中国与俄国陆路通商的交通要冲。由于出口货物在张家口交完税以后，再运至中俄边境路程很长，往返一次差不多要半年时间，商品流转期长，需要更多的垫支资本，商人们往往有求于借贷，所以张家口的账局也应运而生。山西商人开设的账局主要集中在北京、张家口两地。19世纪上半叶账局有了较大的发展，除了山西商人外，其他省份的商人也在北京、天津等地开设了一些账局。账局不仅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工商业资本的主要融通者，而且也是当铺、钱铺和印局等金融机构的支持者，具有高利贷中心的作用。

票号，又称票庄或汇兑庄，大约产生于19世纪20年代初。由于票号也是多为山西人

经营，所以人们又常称之为“山西票号”。清乾隆、嘉庆年间，国内商品货币经济进一步发展，特别是埠际贸易的开展，使得不同城市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。当时迫切需要解决不同地区间收解现金和清算债务的实际问题，先前靠商人自己带运现金，或由镖局押运现金的方式，已越来越不适应商品流通量日益增加，流通区域日益扩大这一客观情况了。于是，某些信誉卓著的商铺利用它们在一些城市设有分号的关系，逐渐地把不同地区间的汇兑，作为兼营的业务承担起来。山西平遥县商人、日升昌颜料铺经理雷履泰鉴于远道解运现金，困难既多，又不安全，试用汇票来清算与日升昌相往来的各地商铺的账目。最初这种清算方法试行于重庆、汉口、天津、北京等地。后来由于汇水收入十分优厚，兼营汇兑的日升昌颜料铺就改为专业的日升昌汇兑票号。日升昌成为票号的鼻祖，雷履泰成为票号的创始人。不久，与雷履泰同县的五家绸布庄、绸缎庄，也先后从原来经营的商店改变为专营汇兑业的票号，人们称之为“平遥蔚字五联号”；山西太谷、祁县也有一些商号陆续改营票号业务。此后，票号作为一种新的金融组织逐渐发展起来。

鸦片战争前，票号的经营几乎全是山西

商人，特别以山西平遥、太谷、祁县三地商人势力最大，所以在当时商业社会中称之为山西票号“三大帮”。它们各以资力大小不同，在若干城市设立分号，并且在互相调剂金融的情况下，构成了一个四通八达的以汇兑为主，以存放款为辅的金融体系。票号的资本比一般钱庄雄厚，而且票号股东所拥有的资本往往超过票号资本的几倍或几十倍。票号的业务活动对商品流通的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，迅速地为社会上所认识，票号博得了“汇通天下”的美称。

随着高利贷的盛行，清代还出现了一种专门经营高利贷的信用组织——印局。它普遍存在于清代各商业城市中，以贷放印子钱为业务，其利息比一般高利贷还要高，多在月息3分至6分。清代中国，还存在着其他一些金融组织。

总之，在鸦片战争前，随着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成分的壮大，中国多种形式的金融组织也处在发展过程中。这一发展过程到了清中叶时，已呈现出加速度发展势态。假如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，中国的金融业仍然会按照自己原有的轨迹发展壮大起来，并在中国商品经济生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。